

姚锡光江鄂日记 (外二种)

姚锡光 著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中华书局



姚锡光江鄂日记 (外二种)

姚锡光 著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姚锡光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0.7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

ISBN 978 - 7 - 101 - 06110 - 9

I. 姚… II. 姚… III. 姚锡光(1857 ~ ?) - 日记
IV.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8290 号

-
- | | |
|-------|---|
| 书 名 | 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 |
| 著 者 | 姚锡光 |
| 整 理 者 | 王 凡 汪叔子 |
| 丛 书 名 |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 |
| 责任编辑 | 欧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
| 印 数 | 1 - 2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110 - 9 |
| 定 价 | 28.00 元 |
-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刊行缘起

编辑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是为给有关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日记是人们对自已的活动、交游、见闻、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记录。一般来说，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且又是当时的记录，因而它的内容也就比较具体、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一般史籍所不载，有的可与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有的还可订正史籍中的讹误。中国近代的许多重要官员、学者、文人都记有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例如著名的《赵烈文日记》、《翁同龢日记》、《越縕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等，都是被研究者经常利用的重要史料。

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的。全国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单位，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也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日记。这些日记，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发掘、整理这批史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除刊印一些著名的日记外，尤其重视确有史料价值的稿本或抄本。整理方法和出版形式，从实际情

况出发,不求一律。有的可以作简要的注释,有的可加目录和索引;比较完整的日记可以单独成书,有些零散、片断的日记则可合为一册。

编好这部丛书,一定会有不少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得到各图书馆,博物馆、学术界、教育界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它是可以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

中华书局编辑部

前 言

政府的文牍和官修的史典，自然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种途径。然而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成功与失败之间，其区别往往仅在于整个事态发展过程中一些细碎微妙环节的处理。而这些内幕，恰恰是我们难以通过冠冕堂皇的公文和春秋模式的正史而加以寻觅和稽考的。可在当时当地、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些事件的人们的私下记载，反而可以丰富我们的视听，使我们发现那些“重大事件下面的渺小的一面”，发现大量客观史实后面的人们的主观意向，发现那些被结果掩盖了的曲折过程。这些满纸当时当地事实和感慨记述的私人文献，就是这样一再提醒我们，“历史一度曾经是实际生活”，是纷繁复杂的。

在社会不同层次生活的人们的日记，还可以向我们揭示：当历史每一个新的趋向莅临之际，每一次潮流波动之余，社会各个层面对之的反应和随之而采取的动作，使我们感到历史是一个多维力量相互作用下的流体，而不再仅仅盯着某一个层面或某一条线索。

基于这种认识，使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搜寻各层人物日记、杂记的稿本的兴趣不衰。在我们从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从《江鄂日记》、《校士日记》、《莅官日记》等私人记载里截用过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其中的一些记载帮我们解开了某个疑案或给我们极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将其整理出来，以期这些史料对其他近代史学者在研究变动激剧的晚清社会时稍有裨益。

《江鄂日记》的作者是姚锡光。姚锡光(1856—?),字石泉,江苏丹徒人。拔贡,举人。初官内阁中书。历佐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幕,曾任安徽牧令,累保道员。曾赴日本考察。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陆军部左丞。宣统年间任陆军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辛亥革命后,姚氏曾为蒙藏事务局副局长、口北宣抚使、参政院参政等职。

《江鄂日记》稿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分四卷,共四册。日记无封面及题签,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95年11月28日至1896年10月26日),几近一年。日记初始,姚氏往谒张之洞,被留驻南洋筹防局任事。姚氏到局后即随德国来华军事教官勘察南洋炮台。光绪二十一年末,张之洞卸两江总督任移节湖广。姚氏因曾在李鸿章治下的天津武备学堂执教,遂被张之洞邀往湖北,委以武备学堂总稽察职,参与了湖北武备学堂整个筹办过程,故日记内对勘察、办学两事叙说甚详。也在这一时期,姚氏完成了《中东兵事纪略》的构思及撰写。其写作时搜爬资料、寻访当事人的情形和即兴感叹于日记中随处可见。为筹建武备学堂事,姚氏时常与张之洞幕中的亲信僚属过往,言谈中得知很多官场秘闻。他将这些听闻一一记入日记,多时日记三四千言。因此,《江鄂日记》是我们了解清政府及封疆大吏在甲午战败后一两年间推行新政展开自救真情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披露了许多官方文牒避而不载的内容,特别是记录了很多与当时报界所刊文字大相径庭的事实,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因日记为姚氏受张之洞之邀,在两江、湖广任事时所记,故名之为《江鄂日记》。

姚氏两度随洋员勘测东海、长江下游炮台。第一次时在光绪

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初七日,所陪洋员为德国教官来春石泰、骆克伯。来春石泰是张之洞在甲午战败后于两江总督任上聘请的教官,委派他按德国方式训练新建的自强军。当时报界曾为此事大加赞誉喝彩。《万国公报》第85卷刊有《南北练军》一文,云:“南洋大臣张香帅,奏准改练陆军,名曰自强军。聘请德国游击来春石泰为全军统领。其营哨各官皆以洋将委充。自去夏为始,先就卫队护军管营内选练二千数百人。及至冬间,操演已有规模。旋募江苏之淮、徐、通、海,安徽之凤、泗、滁、和、太,及江宁之六合、江浦,常州之宜兴、荆溪、江阴、靖江,镇江之丹徒、丹阳各府州县土著乡民年在十六年以上二十岁以下者,续练二千数百人,共合五千人。一切营制暨部伍人数悉照德国章程。……向来营中弊窳,及有名无实之洋操陋习,一扫而空。窃谓以此军练成之后,改隶政府,诚中国自强之长策也。”事实是否确系如此呢?姚氏却另有看法。其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记中写道:“……自今年夏间金陵省垣开练兵公所,雇来德员三四十人。薪水至大者如来春石泰,月七百金,至少者亦月三百金,计月费万四五千金。以三年为期,须费五十余万金。而所教者,不过德国操一项。现在我中国人能德国操者不知凡几,以月二三十金一人,颇可雇充教习,亦颇可著成效(北洋行德国操已十余年)。何至用德员如此多而糜款如此巨?且洋人所教德操,亦颇不整齐。且驰马觅伎,逐日在外滋生事端,绝非善类。中国毫无稽察,且无算计,不知后此何以为国!”在与来某巡视炮台的过程中,姚氏更发现其“处心积虑,在为中国经手军火、包揽工程、安插洋员;且把持公事,藉事招摇,异常恶劣”。来春石泰每到一处,不管地形、各种条件如何,总建议增设炮台。巡至镇江,便喋喋不休地劝清方要从此沿江遍筑炮台。

姚氏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指出：只需在扼要之地屯有劲旅，便可四面应援；备多反而力分。“岂有沿江设守而能自全者？洋员盖意在中国多买炮位以自肥也。”来某还主张在长江口的石头、崇宝两沙设炮台，而这两处的地形根本不适合建炮台，如果筑台，“则适足以资敌人打我……为害甚烈”。然而，来春石泰的建议对炮台的统领却颇有诱惑力，因为“添购炮台，亦必添守台之兵，统兵官亦添出息”。姚氏顿足叹道，“恐江南膏血自此竭矣”，“中国受外人欺罔若此，其何以支”？在巡视中，姚氏还从守炮台将士中了解到，军中雇用的外国教习，大都不具备教习资格。“所用各洋弁有水手、有兵丁、有游民，不明炮理，不知测量，大率来骗〔骗〕中国薪水，最为可恨”。晚清时期聘请洋教习训练军队，诚不失为提高国家军队战斗力和素质的一项可行措施，但因种种缘由和局限，选雇非得其人，终至好事变成坏事，反而拖累了中国近代进步之履，并授与反对派攻击口实，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姚氏第二次勘察时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所陪洋员为德国游击雷诺。雷诺其人不像来春石泰那般贪婪卑劣毕露，但他巡视炮台亦另有所谋。其每至一炮台或重要关隘，都仔细勘测，不仅描绘成图，还用照相器材将真形摄去。“我厄塞之所，彼已视为掌上罗纹。中国开门揖盗，在上者不之知；在下者知之而不能禁，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可哀也夫！”而雷诺所不关心的地方，即便张之洞所嘱必勘测者，他们亦不愿停船（见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

在勘测期间的日记，更具价值的还在于对当时中国海防、江防情况的详细记载。姚氏陪洋员的巡视，是沿东海某段或沿长江下游逐炮台进行的。每个地段、每个关隘或港口有多少炮台，构筑于

何处,位置高低,周围地势环境如何,视野内的情形;每个炮台群由多少炮位组成,中心炮台于何处,每座炮台有多少门炮,有多少守备人员,守备人员归谁统领;每座炮台的炮各为什么型号,属什么类型,炮身重几许,炮身長几许,口径几许,射程多远,射角多宽,填装炮药多少等等,无不一一录下。此外,这些炮台的择地构筑是否得当,炮位配置是否合契,何处应进行调整,何处应增设新台,何处炮台可酌减,何处为防守重点,明台应若何,暗台应若何,炮台整体呼应等等,洋员有什么评说,姚氏自己见解又如何,均叙述颇详。

姚氏应邀由江至鄂,本为辅助筹办湖北武备学堂。但到湖北后空等半月才得见张之洞一面。张告姚氏因经费无着,办武备学堂事从缓,让姚氏先参与湖北自强学堂的调整诸事。张对姚氏谈了自己将自强学堂原有的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减去商务一斋,另增重学、机器、制造三斋的打算,命姚氏为自强学堂总稽查,并草拟调整方案。二十天后,张之洞又托人告姚氏,武备学堂亦准备立即上马,让他同时加拟武备学堂办学章程,并勘选校址。不日,张之洞又托人转告姚氏,其欲将自强学堂更名为储才学堂(亦称楚材学堂),原设之方言、算学、格致及后提之重学、机器、制造等斋一律取消,只设矿冶、植物两学,命姚氏另拟章程。姚氏遵命将武备、储才两学堂章程拟就递上半月余,张之洞又想在储才学堂增设工艺一学,嘱姚重新修改章程。一周后,张之洞又因其对武备学堂课程设置及学生来源有了新想法,命姚氏再拟武备学堂办学章程。姚氏将改拟章程转呈月余,张之洞不知又听信何人之言,罢改自强学堂为储才学堂之念,又欲将矿冶、植物、工艺三学尽行裁去,而改授英文、法文、德文三课。“历月凡五〔三〕,意变凡三”,张之洞这种变幻无定的做法,使姚氏几次劳而无功。特别是有关办学之

事,张之洞不与具体筹划者姚氏亲商,却总是托其亲信转告只言片语;而姚氏的设想和解释,只能具文转呈。“夫开办学堂,乃今日最重大之事。且经营伊始,百度权舆,利弊所关,实非浅鲜,岂笔墨间所能罄尽,亦岂传宣介绍所能殚述?乃中国达官贵人,养尊处优,不轻见客,只凭亲信数人为作喉舌。香帅贤者,且犹不免。劳人志士,为之短气。四方多故,大厦不支,乃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螻恤杞忧,实无纪极”!虽经这几番变故与筹划,直至《江鄂日记》末页,武备学堂开课之事仍属纸上谈兵。观这一段日记,足见甲午战后新政举办之效率。但阅该日记涉及学堂开办与调整的文字,却可使我们发现中国教育领域内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动。此间与祁世长写《校士日记》时相参照,中国的教育从体制到教授内容已有可观变化。姚氏日记录下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办学章程的大体内容,从教学的指导思想、教师的选择、课程的设置等方面都与传统体系相距较远。从社会及士人群体对这种变革的反应来看,也大异于前。祁世长写《校士日记》期间,新与旧不仅还未在社会这一层发生碰撞,简直是尚不为广大社会中下层所知。而在《江鄂日记》最后几日,记武备学堂准备开办,“制府出示招考,而报考现已有二千余人”。而武备学堂规模预计只能容学生二百名左右。可见士子中有部分人已经开始接受这类新型的学堂。这一段日记中还提到了办学经费问题。学堂初拟开办之时,即因经费无着而蒙上一层浓郁的阴影,后几经周折,张之洞决定拨给武备学堂常经费三万两(在正式开办后)。张之洞曾几次托人传话要聘外国教习,而日记中提到一位洋教习的年薪即一万两。由此可知湖广一带最高新式学堂的常经费仅为三名洋教习的年薪,可见教育经费之可怜。日记还提到将往武备学堂任教的洋员并未经过考核挑选,而本为

别的部门所聘,不适合任用,又辞退不掉,便被硬塞给学堂。这样的教员能否胜培养新型人才之任,又可推而想之。

姚氏成名之事,便是撰写了一部记述甲午中日战争的《东方兵事纪略》。《荃楚斋随笔》中有文字云:“光绪甲午,我朝与日本一役,纪事之书约在数种。……惟丹徒姚□□侍郎锡光撰《东方兵事纪略》五卷,光绪丁酉武昌自刊本,其后翻刊本甚多。窃谓言中日战事者,实以此书为最佳。叙事固翔实,文笔亦雅洁,迥非他书所可比拟。”当代史学前辈,如邵循正、陈旭麓均称该书史料翔实,叙事系统相当清楚,可视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姚氏写下《江鄂日记》这段日子,亦是他撰《东方兵事纪略》之时。日记记录了他初撰该书时,取名为《中东兵事纪略》。日记尤其向我们揭示了他为撰写该书而广搜细理有关中日战事资料的过程。凡与姚氏过往的人,只要身与中日战事,姚氏便邀来长谈。凡得知谁有关于战争的记载文稿,必设法借来阅读。他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教习,其很多学生参与了陆战、海战,他都想方联络,以便从这些亲历者那里了解最真实可靠的材料。凡从熟人那里了解到的某些线索,他都不放过,而是找关系辗转联系,发掘更多的材料。此外,他还阅览了大量已出版的有关战事的书籍、图册,剪辑往日的报刊记载,和清政府的有关文牍,并与学生翻译了一些外国人对战事的记载和评述。姚氏《东方兵事纪略》之所以能在众多记述中脱颖而出,原因即在搜集资料上花耗的大量心血。

姚氏佐张之洞后,时与张之洞亲信幕宾过往,从他们那儿得知许多对外辍口不言的官场内幕,姚氏将此都记入了日记。张之洞幕中的众多人物,由于日记中的大量文字而显得栩栩如生。张与他们的亲疏关系,这些人物的品质与性格等等均可通过日记而得

知一二。《江鄂日记》还能使我们对一些以往语焉未详、乃至某些疑案有较清晰的了解或得到一些线索,这十万字的日记所能提供的材料是相当多且广泛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中记载了刘坤一在甲午战后,为重回两江任上而在北京的活动。“此次刘峴帅得回两江任,赂洛中权贵,费银至卅万两,而慈圣所用李太监得银最多”。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二十一日关于太监寇连才上书及被戮的记载,也属难得史料。其中很多对社会及官场流弊的指摘和披露,像张之洞用人不当、治军乏术;像南洋练军公所提调沈敦和及属下桂嵩庆媚事洋员;像湖北铁政局官员的营私舞弊;像王文韶水晶球的绰号;像黎元洪、段琪瑞的早期行踪等等,均为不多见的史料。

关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在有关他的记述追忆中大都提到过他曾请承办芦汉铁路。但对此事的具体细节和来龙去脉,却从未有人能道清一二,以至抱残守缺到今天。而《江鄂日记》的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刘鹗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刘鹗凭什么敢提出承揽芦汉铁路,其洋债从何处借来,他何时到鄂,张之洞与刘鹗就办芦汉铁路一事谈了些什么,张之洞对刘鹗的印象,张之洞对委派何人承揽铁路的迟疑不决,刘鹗为何中途离鄂,张之洞又缘何再召刘鹗来湖北,承办芦汉铁路事如何最后定局,刘鹗对定局的态度,其何时第二次离鄂,日记中均有明确叙述。从中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举棋不定;盛宣怀的得陇望蜀;刘鹗的憨直与热诚;姚锡光的爱莫能助;张之洞幕宾的见风使舵。仅此一事,整个晚清官方机构的运转、办事程序、内部错综复杂的粘带及成一事之难,让人一目了然。

《江鄂日记》、《校士日记》、《莅官日记》相互间并无直接间接联

系,但三部日记均为晚清中下层官员(指写作时)所记,内容又以反映中下层官场和社会情况为主。日记写作的时期不同,恰又可为不同时期情形的参照。三部日记的文字均不太多,所以我们将其合编在一起。日记中文字模糊难辨者及空缺处,用“□”代替;订正原稿错字者,订正文字列于〔 〕内,置于错字之后;增补脱字置于〈 〉内;有衍字则用“[]”标出。至于整理之际,限于学养而或有疏漏欠妥之处,则敬请专家和读者们随时指教为盼。

《校士日记》的作者为祁世长。祁世长(1825—1892),字子禾,号敏斋,祖籍山西寿阳。其父祁嵩藻,官大学士、军机大臣。从道光元年即直南书房;同治元年,又与翁心存、倭仁、李鸿藻共为同治帝授课,为朴学硕儒。祁世长自幼随侍其父,学术上深受嵩藻濡染,笃守儒家性理之说。嵩藻逝后,祁世长由编修荫补侍读。曾督安徽、顺天、浙江学政。历任礼部、吏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他一生恪守义理旧规,“雅不喜西法”。光绪初年,唐廷枢受李鸿章委派,创建开平煤矿。煤矿于光绪五年投产出煤,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任礼部侍郎的祁世长即以煤矿邻近“陵寝重地”为由,奏请封矿。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激于马江战败,外患日逼,撰上清帝第一书。极言时危,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改革主张,请当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祁世长代递。祁世长以有疾恙为辞,未与转呈。从这两件事上,可见祁氏思想属于比较守旧僵化一流。

《校士日记》稿本藏于江西省图书馆。该稿本不分卷,共两册。日记无封面题签,扉页下部有胡思敬题记,记得书来由,曰:“此文恪视学安徽时日记,宣统元年夏四月,得之京城厂肆,因付装池,合文端批本书二册,并为一函。思敬记”。“文恪”,为祁世长谥号;

“文端”则其父寓藻谥号。该日记起始于光绪元年十月初九,止于十二月二十九日(1875年11月6日至1876年1月25日)。在此时期,祁世长正以翰林院侍讲学士提督安徽学政的身份,奔波于皖省的州、府、县之间,按临主持生员科试及童生院试,故而我们将日记定名为《校士日记》。通过该日记,我们可详细了解晚清生员科试及童生院试的全部过程和内容,并借此考查此间科试院试与其前后不同时期科试院试的差异。而更珍贵的是日记乃基于科试院试主宰的视角写的,其记载是总揽考试全局的;同时还清晰地透露了主宰者在整个考试期间的心态。

光绪元年(1875),距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已十年有余,但该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依然能从十年后的《校士日记》里看出。安徽省是太平天国时期战事纷繁的地区。太平军长期经营安徽,一方面向都城“天京”提供粮饷;一方面以此为都城西北的屏障。同时与太平军拼死相敌的淮军亦诞生于此,其兵源、幕吏也由此输送。敌对两方曾在此展开过数次殊死恶战。这些缘由造成了安徽生童大量流动外走的状况。以致对他们前途极关重要的科试,在有些州县竟有百人未到。如日记关于滁州、全椒、来安三处考试情形的记载:“滁、原数二百五十八,不到一百六十四,实到九十四名。全、原数一百九十八,不到九十九,实到九十九名。来原数一百二十九,不到九十五,实到三十四名。共二百二十七名。”祁世长究其原因,认为“滁属遭兵最苦,故人数极少”。

另外,光绪元年属同光中兴时期,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进逼,相与抗衡的洋务运动已经发轫并得到一定拓展。洋务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的主要活动仍囿于军工生产的现代化、武器的更新和军队训练等方面。然而运动的倡导者已经朦胧地感到旧式教育体

制和内容的陈腐,不适应新历史时期所需人材的培养。他们已经着手一些新式学校的创建以及对传统教授内容的更新。在祁世长考核生童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已相继出现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求是学堂、操炮学堂等新型学校。容闳带领的第一批赴美官费留学生已经在大洋彼岸送走了三度春秋。但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中国教育的整体来说,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从祁世长日记里我们还看不出此时上述新变革对千余年承传下来的传统教育内容有丝毫的摇撼。祁世长考核生童的内容,依旧是四书艺、经艺、小学、策论、诗赋及《圣谕广训》之类。这里仅以他在泗州科试时所出题目的记载为例:“四书题‘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策题‘问弥盗之法,在为守令者宽严并用以清其源而遏其流,其各援古证今著于篇’。诗题‘新晴日照山头雪(晴字八均)’。”学政为中央命官,督一省校士之事,其所定考题显然要遵循国家的规范,显然与尔后更高层级的考试密切相关。祁世长原封不动地搬用传统题目考核诸生,必须有三个前提,一即中央有关教育的主旨没有变,也就是教育决策者尚未倡导改革;一即省级主管官员(祁氏本人)没有传统内容已经陈腐的意识;一即赴考生童没有变更内容的请求。这就是说在教育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主管长官、到广大士层群体,对改革传统方式和内容尚无意愿和行动。《校士日记》只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已经存在的改革教育现状的意向和零星的行动,以及西学东渐世界剧变之风,在 1875、1876 年之交,对传统的教育体系远未构成真正的冲击;那微弱的改革呼吁及实践,甚至不为广大社会所知。

通过《校士日记》,我们还可以观察近代中国主管地方教育科

考官吏的社会地位。尽管中国号称礼仪之邦,长期提倡尊师,中国的官吏也必须经历科场之途才能进入较高的仕层,但主管一省科试的官员走入州、府官场中遇到的并非是殷勤与趋奉,在管辖区域内行走,不顺当之事竟接踵而来。祁世长启程时倒是满排场的,随员、仆役数十人,加上地方陪员及轿夫总有百十人,前呼后拥。若择水路,舟船衔尾二三十条,亦颇具声势。但地方州、府官员对他的行踪却似乎很乏兴趣,以致并未把对他的迎送应酬列入日程。有时监场下来,半天得不到饭菜供应,不能不让他把满腹牢骚诉诸笔端。如十一月初七日所载,考试散场后,“直至子初,水菜米面尚未进院。安徽省办考,每县向藩库领四百两;闻此外仍向各县均摊。计考棚大门以内,日用足有数余。而地方官每每迟缓泄沓,实在情理之外”。在前往凤阳巡试途中,被冰封阻于舟中,风寒冰冻数日,竟无人过问。祁世长只好自己出资雇来骡马,弃船狼狈而行,更激起他内心的忿懑。“学政巡试,公事也,而地方官不一援手,奇哉!”“三年承乏辘轳之使,眼中所见千奇百怪,至斯已极。兹不言之上官,恐彼此效尤,学政诸事皆办不动,后亦难为继矣”。

巡试往返于州、府、县之间,在与各地生童的频频接触中,祁世长了解到不少社会下层的情况,以及县级基层官员的政绩,他还为之发过一系列感慨。这些亦可供我们了解晚清中下层官场及社会民情的实况。

《莅官日记》的作者为周长森。江苏六合人。他于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二十九日到江西省崇义县任知县,于同治十年(1871)五月二十六日离任。

《莅官日记》稿本藏于首都图书馆。该稿本不分卷,四册一函,用工整小楷抄写。日记无封面签题,无扉页。正文首页起题“莅官